

林纾评传



张
俊
才
著

林纾，是值得纪念的。

他不失为一个刻苦的人，勤勉的人，正直的人，富于血性的人。

他的横绝一世的翻译事业促使近代文坛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开放气氛。

他对古文理论、特别是对古艺术理论的总结，他对历代优秀古文的选编和评析，对于继承我们民族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不无裨益。

他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缺乏清醒的反省意识。

他对“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和抵触。

他是旧文学的“押阵大将”，又是新文学的“不桃之祖”。

中华书局

林纾评传

张俊才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纾评传/张俊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ISBN 978-7-101-05514-6

I. 林… II. 张… III. 林纾(1852~1924)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82 号

书 名 林纾评传

著 者 张俊才

责任编辑 侯笑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514-6

定 价 38.00 元

林纾现象与“文化保守主义”

(代 序)

王富仁

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康有为、严复、刘半农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则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物^①。实际上,林纾也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在刘半农逝世之后所作,其意不在批评,倒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意思。在平时,我们总认为鲁迅的评人,过于苛刻,实际上,一旦涉及一个人一生的功过,鲁迅总是突出一个人的历史贡献,而将其不足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的。这种评人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就更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或哪一类知识分子所能够独立承担的。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突然遇到了另外一种强势文化的狙击,必须应对,必须有新的变化。但是,如何应对,如何变化,谁都是拿不准的。在这时,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不顾自己的面子,甚至不顾自己的利害,在坚硬的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壳上,啄了一个小洞,让后代的人能够通过这个小洞看到外面一个更广大的世界,那就是功不可没的了。四亿人的一个民族呵!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的能有几个人呢?这样的人,我们能不珍惜吗?但是,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即使在固有传统文化的知识上,他们也是不亚于当时那些平庸的儒者的。章太炎是俞樾的高足,康有为是今文学的传人,林纾则是桐城派古文的高手,没有这样的资本,即使他们较之现在更趋时、更求新,国人也是不会买他们的账的。但是,文化,向来又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因袭容易求新难。这少数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固有传

^① 鲁迅:《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535~536页。

统文化的束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碰在钉子上了,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实际上,人生在世,就是这几十年,青壮年时期活力大些,突破自己容易些,也有跟着时代走的力量和勇气。一当到了“功成名就”,自己也有了一个固定的社会圈子,再变,再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就难了,有时甚至也没有了这种必要。在这时,这些知识分子再回到固有的传统中去,或者停留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文化平面上,不再变,不再趋时和求新,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章太炎,由书斋文人,到改良,再到革命,“七被追扑,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①,革命胜利了,在革命阵营中又受到排挤,再想向前,实在拱不动了,便又回过头来,重操旧业,读古书,讲国学,反成了一个国学大师。在这时,对胡适这类喝过洋墨水提倡白话文革新的人,就看不太惯了。从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后辈青年们看来,章太炎当然有些保守,但在章太炎本人,似乎也只能如此。人,都不是圣人,谁能事事占先、时时正确呢?

但是,历史的事情总是不那么单纯、不那么轻松的,假若社会上只存在着原来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而后来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和新的“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这两类知识分子,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是有个先来后到,后代人不听前代人的劝告,自己走自己的路就行了,反正你前代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问题是,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不拉车、也不想拉车而只想坐车的知识分子。这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太多了。宋代以后,宋明理学有了统治地位,受到官府的保护,成了金科玉律,别人冒犯不得的,读书人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走,照本宣科地跟着说。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才是好官僚,好文人,万一冒出点自己的想法,轻则受人斥责,重则人头落地,满门抄斩。久而久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敢说、不敢动了,不但自己不敢说不敢动,别人说了、别人动了,也感到害怕,恐怕连累了自己。再后来,自己不做事、不说话,而专门挑别人的毛病的人就多了起来,甚至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不成文的传统。他们也有知识,有文化,但所有这些知识,这些文化,都是古代圣贤说过的,绝对挑不出毛病来,这就使自己立在了不败之地。别人不冒头便罢,别人一冒头,他就拿出那些杀手锏来,怎样狠他怎样说,不但压制了别人,还能讨得官府的好感。在有清一代,这叫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以人血染红顶子”。这样，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自愿拉车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不拉车、也不想拉车而只想坐车的人就多了起来。到了清代末年，国难临头，生计日蹙，那些还没有修行到“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①的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有所动作，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仍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些人物是大多数，他们的参与就把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掺合得复杂起来了。在那些“拉车前进的好身手”拉车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屑的，讽刺、挖苦、造谣、诬蔑，甚至罗织罪名、陷人囹圄，但当这些拉车的人又转而“拉车屁股向后”的时候，他们就兴奋起来：看，那些新玩意儿没有什么用吧，我早知道那是没有好结果的！这样，他们反对改革、排斥异己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更加肆无忌惮了，改革者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危险性也更大了。在这时，他们将原来那些“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而现在“拉车屁股向后”的知识分子推在最前面，而他们这一大帮人则簇拥在后，就有了一个更强大的阵容。现在那些拉车的人要想拉着车子往前走，首先就要与原来那些拉车的人为敌，这样的敌人可就好比那些陋儒、腐儒强大得多了，并且又是后辈青年十分尊敬的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历史，就是这三部分人的一团混战，这也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添了很多的麻烦。

林纾的情况又有些特殊性。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在1949年以后建构起来的。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历史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说起的，说到林纾，就只是他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点不光彩的历史。而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讲的是政治史、革命史，作为文学翻译家的林纾，在这个历史中是没有自己的地位的。这样，林纾就仅仅以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卫道士的身份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书上。但必须指出，虽然在文学史上只写了林纾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光彩的历史，但像李何林、王瑶、唐弢这样一些前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对林纾还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鲁迅、胡适等新文学的创始人并不将林纾视为多么不可容忍的怨敌。吵了一架而已！谁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读着林纾的翻译小说进入西方文学的世界的，老头子看不惯年轻一代人的新举措，在中国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儿，他来叫阵，还

^① 《庄子·齐物论》。

是要还嘴的；公开叫阵的如此之少，回骂还是要痛痛快快地回骂的，但即使像鲁迅那么不留情面的杂文家，也没有揪住他不放，到了三十年代就极少提到他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林纾实际是一个没有后账可算的人。阿英是一个晚清文学专家，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就有对林纾翻译小说的正面评价。所以，我们这些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也没有对林纾怀有多么大的恶感。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是个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林纾当然也不会得到一顶多么好的帽子，但比起林纾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戴的帽子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给他戴的帽子也并不算重。早在那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已不是多么了不起的罪名，倒是后来一些新文学作家，成了“右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才是要人命的罪名哩！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冤枉过好多人。林纾，实在算不上多么冤枉。要说缺憾，那是有的，就是没有人再去专门研究这样一个曾经给中国近现代文学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名人，仅仅依靠现代文学史知道林纾的，自然对他有了过于片面的认识。

在中国，真正为林纾研究奠了基的，是张俊才教授。1980年，张俊才教授考取了聊城大学薛绥之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其研究方向就是林纾研究。在这个期间，他和薛绥之教授合作编辑了《林纾研究资料》，1983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之一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大概薛绥之教授起的是指导作用、主要工作都是由张俊才教授做的罢！他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林纾，后来又独立完成了《林纾评传》的写作，1992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薛绥之教授是我们的学术前辈，是一个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之支持并指导张俊才教授研究林纾，说明他对林纾是没有多大的成见的，是将林纾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近代文化名人而尊重的，而张俊才教授之能接受薛绥之教授的指导而专门研究林纾，也说明他对林纾没有太大的成见，也是尊重这个曾经反对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清遗老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张俊才教授才开始了自己的林纾研究，成了中国、大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专心致力于林纾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充分掌握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充分感受、体验、认识林纾这个人和他的人生道路、文化道路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为林纾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只要在这个基础上，林纾研究中现存的一些问题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都不是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必须建立在他一生的劳作上,而不能仅仅以这个人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为依据。即使对这个人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也要有一个具体的分析和感受,不能非敌即友,非友即敌,动不动就扣上一个政治大帽子。但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眼是向外看的,像薛绥之、张俊才这类人微言轻的土包子教授的研究工作,并不为人所看重。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学者才从西方汉学家那里接过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林纾也随之在他们的眼里改变了颜色。最近几年,颇有一些文章是为林纾喊冤叫屈的。按理说,张俊才教授的林纾研究该得到这时人们的青睐了罢?该被这些学者尊为林纾研究的拓荒者了罢?但也不是。因为这时的林纾研究仍然不是从对林纾的具体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直接感受和体验中建构起来的,而是在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好感中转化而来的,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好感则又是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感中转化而来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学者向来是有这种本领的,手一翻,整个世界就变了颜色。——在当代文化史上,这叫“观念的变化”。

但是,这种脱离对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的考察和研究的单纯的“观念的变化”,有时是靠不住的。

中国学者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感、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好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带有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文化又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下发展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进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西方话语霸权、科学技术主义、物质享乐主义也成了不可忽视的文化倾向,而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压抑。在这时,中国学者中滋生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要从对特定对象的研究中得到对特定对象的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的认识,而不能将从此一对象的感受和认识中获得的印象简单地位移到表面相同或相近的对象之上去,更不能上升到全部文化、整个世界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的高度。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牵涉过多的现实问题,也牵涉过多的活着的人,中国学者在现实文化中产生的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感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好感无法通

过对现实文化的分析和研究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向近现代文化、特别是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位移而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是在社会普遍承认了思想自由的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政治权力并不直接干预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文化仍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在其发展形态上,就有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分别。“文化激进主义”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某种需要的推动下产生的,当某种发展的欲望压倒了其他一切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为了某种发展欲望的满足可以牺牲其他一些现实的权益的时候,这种文化就具体表现为“文化激进主义”。这种文化是一种强力型文化,但其力量并不来自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而直接来自它的提倡者的主观意志力量 and 情感力量。这种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是破冰船的作用,它有将所有的阻力全部推开而直指自己既定的追求目标的作用,但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结构,当“文化激进主义”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时,起到的是将人类发展的某种需要强化起来并转化为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的作用,但当这种文化在社会上有了广泛的影响,并有大量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这种文化固有发展目标的追求,仅仅作为文化旗帜而实现自己狭隘自私的实利目的,它就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从而导致社会行动的盲目性和狂热性,导致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在这时,“文化保守主义”就作为一种文化镇静剂而出现了。它更加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更加注重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所不能不注意到的战略和策略,更加注意避免因某个领域的发展而对其他领域的破坏性影响,从而从理想主义的高度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地面。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绝对不是反对任何改革,绝对不是将固有传统凝固化,主张一切都率由旧章。所以,在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绝对不等同于“文化专制主义”,它不是依靠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强行推行的,也不是以社会多数成员的名义对个人思想自由权利的剥夺。但当中国学者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好感转移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就与“文化专制主义”混淆在一起了。严格说来,中国那时只有“文化专制主义”,而没有“文化保守主义”。那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维护固有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统治地位而存在

的,是不承认思想自由这个概念的,甚至也没有文化需要变化、需要发展的意识。他们既不像胡适一样主张渐变,主张进化,也不像陈独秀那样主张突变,主张革命。不变、不能变才是那时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主张。所以,评论那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需要不需要变化,需要不需要发展?需要不需要开放?需要不需要科学和民主?需要不需要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假若需要,你会不会受到当时那些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冷落、歧视、讽刺、挖苦甚至攻击和诬蔑;当你也遇到这些之后将会怎样感受当时中国的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我认为,只有首先想到这一切,我们才会感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斗争、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实质上并不是“文化激进主义”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那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不论在其文化的选位上,还是在其文体特征上,不是更像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像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学术主张,而是更像那些历次政治斗争中的“革命批判家”。(在当时,也有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齐物论释》《诸子学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学术著作,但它们与“五四”新文化构成的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他们使用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所以他们不需要科学论证,不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不需要思考现实社会的需要和当下的具体情况,更不必顾忌被批判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不论表面看来多么彬彬有礼,但给人按上的却是能够引起国民公愤或政治制裁的罪名,上纲上线,或者凶相毕露,或者绵里藏针,但都有可能给对方造成实际的人身伤害。实际上,这种文体本身就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性质,并且与政治专制、经济压迫纠缠在一起的。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乐黛云教授曾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心理。乐黛云教授曾经亲历这种“文化”的批判,我认为,她对这类文章的感受和体验应当更加真切和深刻,她的意见也更值得我们重视。总之,对林纾整个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是一回事,对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的评价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意识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的存在,只要意识到文化专制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只要意识到像林纾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就会依傍当

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反对那些背绳墨、离规矩、在权威话语的词典里找不到依据的出格言论,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原谅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表现,也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减轻他的过失。这些人,失败了也不会有多大实际的损失,胜利了则会给对方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会毁掉人的一生。原谅了林纾,也就原谅了这类知识分子的这类行径,中国知识分子就永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文艺的争鸣,学术的争鸣,必须保障失败者的合法政治权利和人身安全)。总之,用“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无法正确描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表现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范畴,而更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

我们不能原谅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并不意味着不能原谅这个人。这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糊涂”;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异化”。就其身份,林纾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思想言论自由和文化发展吗?有思想言论自由、文化发展,就有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文化发展,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林纾为什么仍然受到我们的重视,为什么仍然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呢?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外国文学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高度的重视吗?不是因为中国现代的翻译文化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吗?没有这些,他作为一个最早的文学翻译家对于我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他不就成了破坏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罪魁祸首了吗?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也拯救了林纾。

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能够从张俊才教授的这部《林纾评传》中读得出来。因为它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的。“评”有各种评法,“传”则是永恒的。

2007年2月8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初 版 序

郑朝宗

四年前,张俊才同志和他的导师薛绥之先生合编一册《林纾研究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曾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一文,题作《评〈林纾研究资料〉兼论林纾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文末说:

林纾是福建人,他对我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既然有了这样一些贡献,我们福建人绝不应该忘记他。像《林纾研究资料》之类的书本应由我省学人负责主编,而今已被外省热心的同志“越俎代庖”了。我恳切希望今后我省文学研究者迎头赶上,把继续深入研究林纾的职责担负起来。这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

非常遗憾,由于体羸多病,我自己是“提倡有余,实行无力”,四年来没有写过一个关于林纾的字,而省内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学者,虽经我的大力敦促,也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下手。现在薛先生不幸病逝,出生于山西省的张俊才同志挺身而出把深入研究林纾的担子单独挑下来。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林纾评传》,到目前为止,是我所见的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关于林纾的专著了,其中不仅把林纾自幼而老的一生经历毫无遗漏地叙述出来,两且把他的所有精神产品——诗、文、小说、翻译等——加以精细的评介,使读者对这位曾经雄视一代的文坛巨子的人品和才情有了较深刻的印象。应该着重指出,作者虽对林纾怀着深厚的感情,但在作评价时始终采取公正不阿的态度,该肯定的便肯定,该批判的便批判,绝不故意回护,也不哗众取宠把诬蔑不实之辞强加在林纾的身上。

这里,我想趁便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附带说一下。我在念小学时,林纾已迁居北京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仍常挂在福州人的口头上。他们称赞他才华出众,每逢文士集会赋诗,他总是首先完卷,他的一枝笔靠在福州南门城墙上简直无人搬得动。他们更钦佩

他乐善好施,勇于助人,他的两位挚友王灼三和林述庵皆不幸早逝,留下孤儿,无依无靠,林纾毅然把他们收养在家里十多年,亲自教诲。灼三的儿子名元龙在后来有点名气,我曾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看过他写的笔力矫健的一副对联:“座上岂容凉血辈,此间大有热心人。”这口气似乎是在歌颂他的恩师。我还曾从林纾的堂妹口里听到一件事:他长期开设私塾,以课徒为生,当地有个著名的恶霸也慕名把儿子送来就学。那孩子既蠢又顽,常常闹事,一天林纾狠狠地教训了他。翌日恶霸登门问罪,意欲动武,林纾二话不说,端起顽童的书桌摔到院子里,然后用福州方言对恶霸进行了最尖锐的“国骂”。一向横行无忌的恶霸竟然被这位懂得拳术的举人老夫子所慑服,乖乖地背着书桌牵着儿子狼狈退却。关于林纾的事,我从父亲口里听得最多。父亲一生敬仰“琴南先生”,常向我们宣扬他的学问和人品。20世纪初北京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叫“五城学堂”,那校长(当时称“监督”)是福州人,教职员多数来自福建,林纾被聘为“总教习”。我父亲因无功名,只得当个职员。他为人勤劳谨慎,林纾很快就看上了他,常请他帮助抄写译稿,给予厚酬,以资养家。父亲因此常得出入林府,眼见林老“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译书情况。他非常佩服林纾思想敏捷,文字雅畅,往往口译者声尚未止,而笔述者笔已放下,没有这样的捷才是无法达到每小时译千字的速度的。正因为译得快,所以字迹异常潦草,且常出现误字,这就需要像我父亲那样心细的人为他一一校正誊清,然后送交出版社。记得小时在我家厨房楼上的书箱里看到几册林纾的译稿和他写给我父亲的一包书信,当时不知宝贵,以后久别故土,“文革”后回福州重寻旧物,不仅译稿化为乌有,连书箱也不见了,真是“在劫难逃”啊!林纾一生勤劳,每日译书、作文、绘画,在那间被陈衍唤作“造币厂”的工作室里忙个没完没了,但他身后萧条,逝世没几年,便举家迁往北京城外南下洼的福州会馆。

从人品看,林纾是无可指摘的。他出身寒微,从不忘本,中了举人后,不肯当官,一辈子自食其力;他热爱祖国,痛恨外国侵略者,也曾倾向维新,醉心改革;清帝逊位后,虽怀恋主之情,却无企图复辟的罪行,这一点是高出于康有为、严复等之上的。因此我同意本书作者的论断,林纾晚节较差主要是由于思想僵化,而与政治野心无关。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攻击白话发展到对所有的新思想、新道德都不满,变成了十足背时的堂吉诃德。然而仅凭这一点便否定

他的整个历史,也不公道,因为正如本书所说,他又是“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过间接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这作用来自他的翻译事业。林纾不识一字外文,却凭口译笔述的方式译出了将近二百种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对后来的新文学巨子给予了启蒙教育,使他们以此为典范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数典不应忘祖,也许是有鉴于此,“五四”时期曾经猛烈攻击过林纾的那些进步作家,后来又一个个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受过林纾的影响,林纾并不是不可救药的顽固派。

林纾是个多方面的人才,他的诗、文、绘画都有相当造诣,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多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唯有他的翻译至今仍受到人们宝贵。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不止钱先生一人。问题在于“漏译误译随处都是”的译本何以还具有如此魔力?钱先生明确告诉我们“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而是因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林纾是个天分极高的人,虽然不懂外文,但在做了一些“笔述”之后,竟然“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更进而悟到“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转引自钱文),于是便“把《左传》《史记》等和迭更司、森彼得的叙事来比拟”,企图以我之长济彼之短,浑不管翻译和创作的区别。这样做的结果是从翻译的领域跨入比较文学的园地。林纾当然不会梦想到世间有所谓“比较文学”这门学问,但通过翻译实践他结结实实地给中西比较文学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实例和不无可取的见解,他终于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开山之祖。

我很抱歉,这篇浅陋的序文介绍林纾本人远比论述《林纾评传》为多,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张俊才同志确实费了很大力气,从各方面广搜资料,精研细磨,把与林纾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挖掘得了无剩义,不给别人以插嘴的余地。单凭这点,我认为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因此我谨掬诚把它推荐给读者。

1987年9月23日,于厦门。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寒门子弟	4
一、“畏庐身世出寒微”	4
二、“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9
三、“畏天而循分”的家教	11
第二章 壬午举人	16
一、丧葬接踵,贫病交迫	16
二、从“狂生”到“举人”	19
三、结交士流与诗社唱和	24
第三章 宦情扫地	29
一、六试礼部,不及一第	29
二、伤时感乱,呼唤救国	33
三、学嗜宋学,文尊古文	38
第四章 步入文坛	45
一、响应维新的诗歌 ——《闽中新乐府》	45
二、诗见与诗派	54
三、奇迹般地跻身译界 ——《巴黎茶花女遗事》	60
四、在“戊戌变法”之年	64

第五章 译坛泰斗	71
一、客居杭州	
——“西湖补柳翁”与《黑奴吁天录》	71
二、应聘入京	
——“译才并世数严林”	75
三、译书思想	
——“此即畏庐之实业也”	86
四、译文特色	
——“文章确实很好”	94
第六章 译业贡献	104
一、新文学的“不祧之祖”	104
二、中西文学的比较及收获	115
三、林译的语言及价值	123
第七章 辛亥前后	134
一、辛亥之前	
——落伍中的忧愤	134
二、辛亥之年	
——惊恐中的转变	140
三、辛亥之后	
——痛苦中的绝望	146
第八章 “遗老”生涯	158
一、“念念不忘故主”	158
二、在“称帝”与“复辟”的闹剧中	164
三、“着意为小说”——长篇	169
四、“着意为小说”——短篇	180
五、《畏庐诗存》与“传奇”之作	187
第九章 古文殿军	196
一、“力延古文之一线”	196

二、《春觉斋论文》·····	202
三、古文作品概观·····	209
第十章 悲剧结局 ·····	219
一、在“五四”新旧思潮激战中·····	219
二、孤愤暮年·····	237
三、抱恨而逝·····	243
结 语 ·····	249
附录一：林纾著作目录 ·····	254
附录二：林纾翻译目录 ·····	268
附录三：参考文献 ·····	294
初版后记 ·····	298
修订本跋 ·····	300